

守護記憶 由八九到現在

三十年前，北京發生一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。當時不論是中國人、香港人或是海外華人，都持續關注運動的發展，期待這場運動會為中國極權、腐敗的政局帶來改變。不過六四的一聲槍響，令期望落空。廣場上的血淚，深深烙印在港人腦海中。時至今日，六四對香港而言意義何在？我們訪問了當年曾參與香港聲援行動的自主工運人士，了解他們聲援八九民運的原因，怎樣守護六四記憶，與及六四現在的意義。

工盟 六四

專號

香港職工會聯盟
 地址：九龍彌敦道557-559號
 永旺行19樓
 電話：2770 8668
 傳真：2770 7388
 電郵：hkctu@hkctu.org.hk
 網頁：www.hkctu.org.hk
 職工盟

郵政工會一 以不同形式延續參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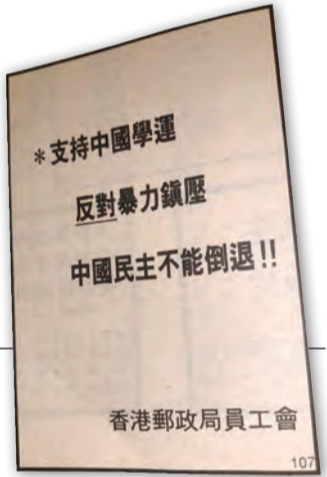


郵政工會作為政府僱員工會，許多人預計在政治上會較保守。可是，當時工會一直都有關注八九民運。我們訪問了當時的工會副組織主任翁誠光（光哥），了解郵政工會在六四事件後的行動和態度。

八九民運期間，郵政工會的意識一直較為進步，這與時任工會主席蕭賢英高調參與民運有關。同時，正值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五年，香港人關心回歸後的生活和內地的政治環境，郵政工會都受這浪潮影響，關注八九民運。當年的工會副福利主任，更走上北京與學生、工人接觸支持民運。

六四事件發生後，郵政工會響應當年支聯會的號召，組織會員發動罷工。雖然後來支聯會領袖臨時取消了行動，但工會早已召集好同事行動，於是自發組織工人罷工半日，去悼念六四死難者，又到新華社獻花致意。為表對事件的支持，郵政工會加入成為支聯會團體成員。

可是，隨著回歸臨近，有會員擔心支聯會團體成員的身份，會為工會帶來負面影響。事實上當年香港社會，對回歸後的政治環境，和「秋後算帳」感到恐懼。即使理事一直嘗試釋除會員疑慮，最終仍於九六年決定退出支聯會。光哥在憶述當時的情況時，語氣中都透露出惋惜。不過，有不少工會理事，包括光哥自己，繼續參與支聯會的工作，如協助擔任悼念晚會糾察等。



批工聯會不堪 由反對屠城變粉飾太平

現時為社區及院舍照顧總工會秘書的鄭清發（發哥），當時是工聯會的會員，甚至有參與一些會務工作，算是比較積極。在八九民運發生的時期，他與其他會員也有關注事件發展。

「學生於胡耀邦出殯請願時，我們已經開始關注和討論事件，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為社會帶來不少問題」發哥說。「六四事件發生時，我們也與當時的工聯會一樣，覺得憤怒和不解，認為政府有更好的方式處理。」他很記得，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，工聯會曾於報章上發聲明，譴責中國政府針對民運人士的武力鎮壓。

「可是到八九年的八、九月時，一切都不一樣了。工會上層人士指事件與香港人的認知有分別，當時我和其他會員都感到錯愕。去到九月，譚耀宗於上京開會回港後，在工人俱樂部開大會，指公眾對事件有錯誤理解，事件涉及國家命脈，令人懷疑工聯會再次走上民族主義的回頭路。」

對此不滿的發哥，在其他工運人士協助下，發表聲明對工聯會予以譴責，最後更辦理手續退出工聯會。原先帶著期望走入工聯會的發哥，最終對民族主義先於一切的立場感到失望而退出。其後，發哥參與了自主工會運動，多年後更先後擔任職工盟的主席及會長。

除了工會工作外，發哥也有參與關注中國勞工權益的工作。他坦言，平反六四，他這一輩的人都很可能看不見，不過他認為香港人既然有空間，理應為六四，為國內不同的人權問題發聲。



由空姐到主席一 走過北京的吳敏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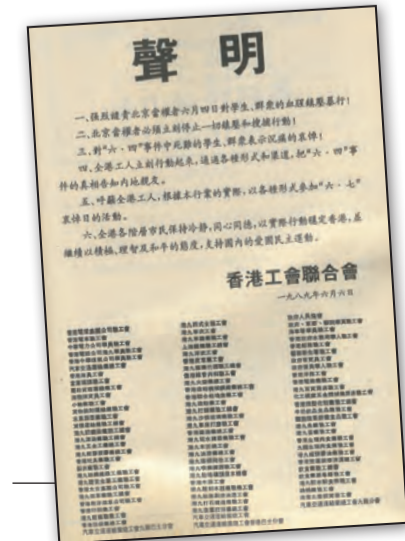
現任職工盟主席吳敏兒（Carol），八九年於國泰從事機場地勤工作，參與了當時的「黑紗纏臂」悼念行動。

「當時我才剛進國泰工作，不過同事早於五月份已關注民運。當時我們於富豪酒店有一個有電視的休息室，我們會於休息時間在裡面看新聞。宣佈戒嚴時，我們彷彿也感受到北京的緊張氣氛。解放軍入城、開槍當晚，我們在休息室觀看新聞直播片段時，有些同事表現十分激動」Carol說。

「第二天，有一兩個對時事較關心的主管，於休息室放了一個裝滿扣針、黑布的膠袋，呼籲同事將黑布纏在手臂上，悼念事件中的死難者。當時行動持續了一段時間，兩個星期後我仍見到有同事的手臂上纏著黑布。」

問及當時對事件的感受，她表示對政府的做法不能接受，應有其他方法去處理。不過，她坦言當時對中國的民情並不了解，六四事件令她希望增加認識。後來她轉職到英國航空，到北京工作時，她有更多機會接觸內地的民眾。當她走過當年六四事件發生的地方「瞻仰」，便會不期然想像當時的氣氛。「有一次我與一個較為相熟的商店職員閒聊，問他是否有談過六四或其他政府問題時，他緊張地叫我不要再說，令我感受到他們的壓抑。」

由英航工會到職工盟主席，現在的她看待六四這段歷史，有另一個層次的想法：「內地的自主工運人士，在中共治下面對種種打壓，香港政府作為中共的爪牙，自然會緊隨腳步打壓香港的勞工權益，令我們的工作更加困難。」



守護記憶， 將八九 民運精神 延續下去

香港的民運自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後走入低潮，要捱過這段時間，Carol認為八九民運的精神可以帶來改變：「六四發生至今三十年，政權仍然逃避責任，反映的是中共懼怕他們的所作所為，會逼使社會要求改變。八九民運後，內地的民主運動至今仍未走出低谷，但內地、香港仍然有一群人在堅持。雨傘後才不過四、五年的光景，未來有很長的路要走，只有堅持下去，不忘初心，好像這一群為六四死難者追求公義，延續八九精神的抗爭者一樣，終有一天可帶來制度的改變。」

工人團結學生 成八九民運後期的 中堅力量

——訪問首都工自聯 法律顧問李進進



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，
我們在民主運動中必須要體現中堅力量。

~《工人宣言》(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)

工人團結學生，成立首都工自聯

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，中國的第一個自治工會宣佈在北京成立。李鵬等人同日深夜召開了北京政軍幹部大會，宣布北京戒嚴。正當八九民主運動步入風雨飄搖之際，天安門廣場內終於豎立起一面屬於工人的旗幟——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，標誌著壓抑已久的工人階級，正式肩負起民主運動的中堅力量。

在首都工自聯的核心成員中，除了工人代表之外，還有多名學生領袖，充分體現了「工學團結」的精神。時任首都工自聯法律顧問的李進進，八九年正是一名北大憲法博士研究生。當收到本刊的訪問邀請時，李進進爽快地摘下八字回覆：「紀念六四，義不容辭」。當三十年的光景正不斷地磨滅著不少人對守護六四記憶的堅持時，這八字回覆，盡顯李進進對爭取民主的初心未泯。「在首都工自聯未正式成立之前，工人已積極地組織起來參與民運，並提出了許多有關勞工權益以及成立工人組織的訴求。可惜由於未取得學生的支持或某種的認可，工人組織遲遲未能建立起來」。但工人不但沒有因此而自我邊緣化，更主動地接觸學生擴大運動的團結面。「五月十九日凌晨，我在廣場內的北大帳篷內與幾名朋友聊天。正當我與作家鄭義先生和幾位同學聊起邀請工人參與學運這課題時，湊巧有兩位工人代表走進來，說人民大會堂東面廣場有幾百名工人正在聚集，醞釀籌組工會，希望得到學生的支持。我自告奮勇地跟他們去了，並代表學生組織表達對工人們的支持。」

「我記得那兩位走進北大帳篷的工人代表是白東平和岳武。向工友發表完講話後，我隨即返回北大的帳篷起草了份《首都工人宣言》，並得到工人群眾的一致通過。通過《宣言》後，我建議成立一個籌委會。由於我是學生，就自願擔任他們的『法律顧問』一職。」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的凌晨三四時許，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自主工人組織——首都工自聯——就在工學團結的背景下成立。



我們向全國工人宣告：北京工人已經組織起來了。

~《首都工人宣言》(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)

工人當家作主：啟發全國工人組織起來

工人群眾參與八九民運，並非始於首都工自聯的成立。早於四月二十七日的高校生大遊行，已有大批北京市民和工人群眾上街表達對學生的支持。而五月十七日北京百萬群眾大遊行，更有不少工作單位組織了工人加入遊行行列，「工人來了」、「工人愛學生」、「XX廠工人聲援學生」的橫幅在整個北京街上飄揚，工人旗幟鮮明地投入運動。同時，不少工人和北京市民亦自發組織糾察隊，在天安門廣場一帶守護絕食學生。李進進強調：「首都工自聯的成立，標誌著學生運動已發展成為全民運動，而工人亦應當領導這場運動。同時首都工自聯亦帶起了牽頭的作用，號召全國工人組織起來。」的而且確，自首都工自聯成立後，在上海、廣州、杭州、濟南、長沙、南京、西安、蘇州、福州、呼和浩特等市也相繼成立自主工人組織。



工人參與民運：由客體變主體

在民運的最後兩個星期，首都工自聯在戒嚴、軍管等動盪不安的背景迅速有序地組織起來。工人有計劃地展開了廣播、發佈傳單、與學生聯絡和堵截軍人等工作。李進進亦多番強調首都工自聯的動員能力，對運動的文宣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。「工自聯成立後在天安門西觀禮台設立了廣播站，設備由周勇軍購買和組裝，成為廣場內最響亮的音響。由於靠近長安街，工自聯的廣播站可以向長安街上的途人進行廣播。一批又一批的北京市民，就在長安街駐足收聽我們的宣傳。同時，工自聯亦肩負起印刷傳單的責任，在運動後期負責廣場內文宣的印刷和分發。」

在首都工自聯的核心人物中，除了工人出身的白東平、趙品澐、韓東方等人之外，也有李進進和周勇軍這樣的學生代表，發揮了先進工人和學生團結的強大力量。即使在最嚴峻的環境中，首都工自聯仍能在短短的數日間制定了籌建綱領和臨時章程，無論在文宣或後勤支援中，均有條不紊地組織動員工人群眾參與。五月三十日，三名工人代表被公安拘捕，首都工自聯隨即動員數百名群眾到公安局前抗議，行動更獲得大批學生到場「聲援」。談到對這次工學團結的「小勝利」，李進進依然表現得非常雀躍：「這次行動非常成功，當局在第二天隨即釋放三位工人。」事件證明工人已由運動初期聲援學生的客體，逐步地發展成為共同領導運動的主體。

但隨著中共武力鎮壓，這短暫的自由也成為絕響。六四屠城後，工人受到極嚴厲的鎮壓。包括韓東方、劉煥文、劉強、周勇軍等工自聯核心成員紛紛在全國各地落網；多名工人被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。李進進則於六月十日在武漢家中被捕，被控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。九三年獲釋後移居美國，現為紐約執業律師。

儘管她在中國近代史中最嚴峻的關頭誕生，但首都工自聯卻在短短的兩星期間，展現出高度的組織紀律和機動性，成為中國工人「當家作主」的其中一個典範。然而，諸如改善生活、杜絕貪官污吏、成立自主工會等三十年前工人提出的訴求，至今仍未得到落實；各地工自聯的骨幹成員：李旺陽、劉少明、白東平、周勇軍等在大陸仍持續受到當局的迫害。但我們不會忘記，工人為八九民主運動所作出的貢獻。我們也寄望，「工學團結」的力量，終有一天成為香港和中國社會變革的中堅力量。



在荒土播種

三個八十後文史通識教師

「人與極權的鬥爭，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。」持守六四記憶，是香港人與中共最龐大而持久的戰爭。這場戰爭包含了好多場戰役，以啟民智的教育工作，正是中共念茲在茲的戰場。兩個張Sir，一個田生，這三個八十後教師，被教協「折服」，加入了教協的理事會內閣，他們如何談六四和教育？

田方澤
一九八八年生
教協副會長
中學通識教師
中大社會學系本科
副修歷史

張往
一九八九年生
教協理事
教育及研究部副主任
中學歷史、通識教師
浸大歷史系本科

張珉聰
一九八五年生
教協理事
中學中文教師
中大中文系本科
副修政政

知道記者想談六四，田方澤隨手便拿出今期《教協報》，〈六四專題〉佔六大版，時隔三十年，是仍然堅持的份量。教協多年以來，一直是「六四記憶之戰」的中堅。多年來，教協出版多種「八九民運教材」，讓教師們可以「憑良心，教六四」。還會進行「六四舞台」演出贊助計劃，以藝術教育為手法，每年都有數十間中學參加，令六四記憶得以傳承。

一九八九那年，教協是少數獨立工會的大戶，已成立十六年。當時教協的會所才剛搬到旺角好望角大廈不久，偌大的會所成為了聲援民運者的聚腳點。時任教協會長司徒華後來更成為了領導支聯會的主力。時任教協理事會成員，小學老師潘天賜告訴筆者：「民運已不止是教協之事，在那時的社會氣氛，會員和民眾自發來到會所做義工，將訊息散發。」學校仍然運作，「可是教師們都無法只按課程教書，那一個半月，教師跟學生討論得最多的，一定是北京的民運。」

據說自此之後，「八九一代」的老師，不多不少，都會在課堂上辟出篇幅跟學生們談六四，儘管這宗官方避談的血案，既不會成為考試題目，也不是課程重點。而不少學校更會在五、六月的周會上介紹六四。教六四的責任，如今已來到「沒有親身經歷」的一輩；而在校的學生，更加連主權移交也沒有經歷過。這樣的薪火，如何相傳？

「其實我們不會特意在課上談六四，」通識老師田方澤如是說：「硬銷反倒沒用呢！尤其是我這些已『被定型』的通識老師。」通識科著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，「談到改革開放、身份認同時，便會自然『順道』教六四」不過，對於田老師而言，「不經意談到六四」的機會還多著。「有時早會又會談，通識的課外活動，會帶學生去六四紀念館——這不也是一種國情學習嗎？」

比起「傳承記憶」，歷史老師張往更著重的，是如何勾起學生對八九民運的好奇心。「在平時的課堂上，滲入價值觀，每年到五、六月，學生知道六四，自然會問的。他們一問，便把握機會講解。」張往也形容自己「不刻意」。

這一代的老師，六四發生時還不夠十歲，他們已不能再說「想當年我參加百萬人大遊行……」，他們更需要令學生找到事件與今日的關係。教中文科的珉聰，形容自己在梁振英當特首之後，才在課堂上多談六四和社會時事。「我的方法是跟學生做『舉例論證』啊，我們不是學什麼「仁政王道」嗎？現在的中港政府，是很好的反面教材。」珉聰更著重讓學生了解到六四與當今中國、香港的關係。

「當下的政治環境、六四和香港，三者其實互相扣連，

構成了一個鐵三角。我常與學生說，要了解為什麼今天香港面對這樣的問題，一定要了解六四是什麼一回事。」田方澤也強調，如果孤立地教六四，對於好多學生而言，與其他歷史事件沒有好大分別，「像跟他們談南京大屠殺一樣，疏離。」

「所以，比起談六四，其實我更喜歡跟學生談當下的中國，」田方澤說：「談起中國的『人臉識別』技術，學生們可興奮哩。然後，我們便可以跟他們談近年的維權運動、告訴他們：『六四其實仍是現在進行式』。」

「其實即使是成年人也會漠然，更何況學生呢？」張往說，自己還算讀過歷史，聽過當年親身上街的人的自述，才有更深感受，對於現在的學生，實在不能苛求他們看過一兩段短片便如感同身受。不過，六四的教育於他仍然有莫大意義：「我自己很佩服當年港人的堅持，我自己讀歷史的，也不希望香港本來擁有的東西逐漸失去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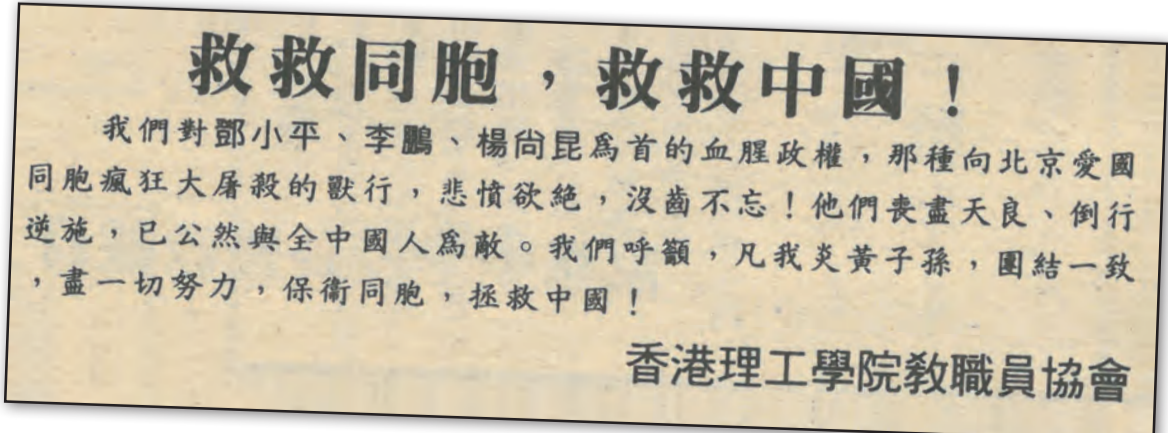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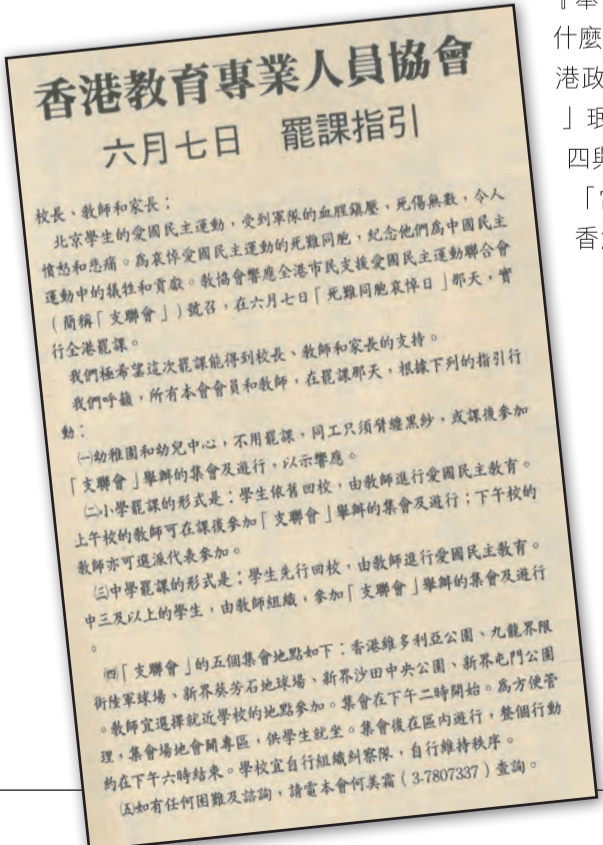
張往特別提到稍早時，史家余英時提出的省思，他指香港人「平反六四」的口號是走錯方向。「『平反六四』的口號假設認同了現政權終有一天會『痛改前非』，這種傳統的觀念也許正是令中國政治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。」

的確，在49年之後，中共史上的政治運動，往往將一批人扣上「帽子」，因應時勢，或稱為「反革命」，或稱為「黑五類」。「平反」的意思，很多時是「摘帽」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在新的政治需要下，舊皇帝的政敵得以「摘帽」，卻不代表國家邁向開明進步。

珉聰對此只感認同：「有些支聯會的口號，撫心自問，我也不願喊出來」有些說話，不料由「教協理事」講出來。「其實這些綱領，大家心知沒有市場，因為暴政種下的仇恨已然太深了。」珉聰如此分析：「但口號歸口號，支聯會和相關的平台，是不可或缺。有本土派提出用不同方式，各自悼念，我非常尊重；但有些人將六四說成只是『中國人的事』，與香港人無關，這就大大不可了。」

「愛國民主運動」中的「愛國」，在過去幾年常被批評為「強化中國人身份」。「無可否認的是，政府正強推一種官方的『愛國』，而支聯會提出的『愛國』，是與之相抗衡的。」張往回應：「有一種『愛國』，與自由價值的精神並不相違背。」田方澤更是簡單：「參加晚會的人更關心的是承傳記憶，倒不見得是為了身份認同。」

那麼，今時今日在校園談六四，有壓力嗎？珉聰只笑說：「紅線還未劃到這兒，能談便談吧，還不用怕。」這種態度，也是一種身教吧。比起個人觀點，三位老師現在更看重自己能做些什麼。看起來「願者上鈞」的張往，今年會有個新嘗試，「這年試著約有興趣的畢業生參加晚會吧。」





職工盟 六四 三十週年 聲明

我們的力量來源於團結， 成功來源於堅定的信念

守護六四記憶，抗衡中共專制

三十年前，香港人從電視直播中，目睹了巍峨聳立在天安門廣場內的民主女神像，被解放軍的鐵蹄蹂躪推倒。為了守護代表民主與自由的天安門廣場，無數工人和學生不惜獻上鮮血和生命。這段驚心動魄的記憶，深深地烙在每位香港人的心裡。

可惜，三十年後的今天，有人卻拒絕承認，甚至選擇遺忘這段記憶。但職工盟不會忘記：我們沒有忘記工人與學生對追求公義與民主的熱誠；我們沒有忘記中共官員對工人與學生訴求的輕蔑；我們更沒有忘掉工人與學生的果敢和英勇。當年多個城市的工人，為掙脫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枷鎖，紛紛組成工人自治聯會參與民運。在中共建政史上，工人首度實現結社自由的權利。但隨著中共武力鎮壓，這短暫的自由也成為絕響。

近年，自習近平上台至今，其強硬的作風已令國內不少工運人士飽受政權的折磨。李旺陽、劉少明、白東平、周勇軍等來自全國各地的工自聯骨幹，多年後仍受到中共政權不同程度的打壓。而不論在八九年還是一九年的中國工人，要「站起來」成立自主工會，同樣須要承受極大的政治風險。二零一八年的深圳佳士工人，就正因為嘗試自組工會而慘遭當局誣衊和鎮壓，至今已有超過五十名工

人和學生被捕。但可恨的是，正當習近平堂而皇之地把「推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」寫入《憲法》的時候，佳士工人的慘痛經歷正引證了中共所謂的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，說穿了，只不過是官僚和資本家勾結的利益共同體。

林鄭治下的特區政府肆意打壓異己，與習政權的強硬作風不無關係。由政治檢控「佔中九子」，到大灣區「被規劃」以至無視民意強推高鐵「一地兩檢」和《逃犯條例》修訂等，均反映特區政府已無視「一國兩制，高度自治」，只顧落實習政權的全權控制：香港正瀕臨步入「一國一制」的黑暗年代。

首都工自聯籌委會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發表的《工人宣言》中提到：

「……摧毀專制和獨裁，推進國家的民主化，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。
我們的力量來源於團結，成功來源於堅定的信念」

因此，職工盟深信守護六四記憶，除了是肩負起直面良知這道德責任外，更承擔著抵抗中共強權的歷史使命。正當兩地的工人與公民權利不斷被中共政權僭越之際，我們選擇以堅定的信念，義不容辭地去履行我們推動民主化的責任，為摧毀中共專制和獨裁，繼續團結兩地工人一起奮鬥。



他就這樣
站著入睡。

李旺陽逝世七周年詩歌晚會

日期 | 2019年6月6日 演出單位 | 黃衍仁 x 劉子斌
時間 | 19:30 - 21:30 金佩璋
地點 | 尖沙咀文化中心百步梯 Sring@IMWU
Lenny x June x 陳清華

概念源自工人詩人許立志《我就那樣站著入睡》

尊嚴工作，由您成全！
取回「工」道，靠您支持！

▶▶▶ 香港職工會聯盟捐款戶口：恒生銀行295-164578-001